

海峡两岸小说论评

王淑秧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海峡两岸小说论评

王淑秧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海峡两岸小说论评

王淑秧 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 39 号 邮码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 61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
开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张: 8.5 插页 2

1992 年 4 月第 1 版 199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16 000 册数: 1-3 000

*

ISBN 7-300-01266-3
1·85 定价: 5.10 元

序：整合离析的文学

——从王淑秧《海峡两岸小说论评》谈起

杨 匡 汉

我们面临着又一个世纪之交。20世纪即将退至幕后，21世纪的钟声在远处鸣响。世纪之交自然是时间概念，这对于逝川与流光比较敏感的知识者来说，都会对世纪末连接着新世纪的情景，有所回首，也有所前瞻和畅想。

应当确认，世纪之交往往对人们的思想感情产生影响。同样，这种影响也作用于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工作的我们。就我们所面对的文学情势而言，客观世界已变得更见丰富复杂，中国当代文学被人为的海峡隔裂的格局已出现变动。此时此刻，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原则，并且以高瞻远瞩的目光，以强者和智者的姿态，既在历时的意义上与历史对话，又在共时的意义上与他人对话，以特色和创造投入中国文学的整体性建设与发展，不辜负这一片阔大的、山海相连的精神热土。

近几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新鲜话题。其中牵动着我思索较多的话题之一，即是整体研究空间的扩大问题。

我无意在此评估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不同年龄和不同风格的批评家们实绩的高低优劣。但我愿意指出，从目前大量的关于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或多或少都受到一种

“时空割断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其一，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缺少古今中外经典理论的融汇贯通，并在正确性原则的指导下体现出独到的智慧的度，因而在评论和研究对象时站得不高，看得不深；其二，缺乏厚实的“背景”意识，即史识，未能很好注意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和历史氛围中的生长与发展，因而也是一民族文化的流变；其三，缺乏有机的整体把握，从文类、文本到地区、作家的研究，从意识形态特征到创作的风格流派的探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某种机械的切割，未能从普遍的艺术规律着眼去考察同中之异或异中之同，即使相左，也不是不可寻求全方位的异向互补。由于上列的不足，使不少当代文学研究往往泥乎就作品谈作品、就作家谈作家、就现象谈现象的囿域，显示了穿透力、沟通力和整合力的薄弱。这一情状，在刚刚起步不久的对台湾地区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它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研究空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里，似乎更暴露其弱点。

我们不必总是以“新兴”、“稚嫩”寻求自我安慰。在我看来，倒不妨从思维方式上探讨一下治学与研究上的欠缺。今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国著名的东方语言学家和史学家季羡林教授指出：“以分析思维为根基的西方文化渐渐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以综合或整体思维为根基的东方文化将取而代之。”此乃卓识，对于从事研究者很有启窦。我们自然不敢断言在一个早晨或世纪之交就轻易地“取而代之”，但前者不能“千秋万岁”，后者在澄怀观道而得更高境界方面越发显示其优越性，则是无可置疑的。即以文学研究而论，自19世纪以来盛行于西方的科学主义和分析主义流播于我国，进而导致各地文学、各门学科的“各自为政”乃至“分崩离析”；某些重方法而轻本体的研究成果，亦常常滞于论断的层次——借助阐明法的实例，而作关于本土文学的结论，局限性显而易见。鉴于此，有识之士已倡议“20世纪中国文学”，或提出“共同诗学”与“比较诗学”的构

想，以求重新整合离析的文学，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学批评体系，并用“同体异型”的思路去处理复杂丰富的现代及当代中国文学现象，寻找异彩纷呈的文学殊相和潜沉不露的文学共相。应当说，这是富于建设性的学术见解，是倾向于综合而不是分析的中国式有机整体思维的现代体现。

若是论及台湾地区现当代文学，不管是日据时期的封锁还是近四十年的隔绝，它毕竟是整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历时的传承和共时的关联，都难能割断它与中华民族文学母体的血脉。诚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所说：“艺术与本身，连同他所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比艺术家更大，就是他所隶属的同时同地的艺术宗派或艺术家族”。既然我们民族艺术的“宗派”和“家族”如此博大、如此源远流长，那么，也只有以整体流变的中国新文学为参照，才能察见台湾文学的真实风貌和多维关系，才能在民族精神与地域特色的联结互补中探求风格的变异，研究工作就会在历史的整个链条上活起来。

正是出于上述的断想，看到同事王淑秧女士有新著《海峡两岸小说论评》行将问世，我不仅为她的春锄有成而由衷地喜悦，更为她非敢谓密于学、但期拓于境的精神而兴奋。作为学者，王淑秧女士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理论蕴积已臻丰厚，这就使她即便是刚刚涉足台湾文学，亦能保持一种理论的态势，力求知性投入，审理渊源，开拓视野；她多年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十分关注，热心追踪海峡两岸作家的新作，这就使她得以与时代共同着脉搏，与作家共同着呼吸，并且通过比较和鉴别，在“现存”与“合理”之间获取固有的文理；她注重史实的查证和个案的凝视，却又在具体品评时，揣研主体与客体双向切近的流程，努力脱开单一的社会层面和表层意象，潜入作品的深层游动，去拓展艺术的整体研究空间。这样，她在对台湾地

区文学进行整体观照时，大体上能全般、允正，透过真伪杂揉、交相混现的事象，抛弃简单化的非 A 即 B、黑与白的两极批评模式，品评作为多维关系总合的文学，不哗众取宠而贵于求实，从而形成了真诚的对话态势。

《海峡两岸小说论评》作为论文结集，大致分为综合评论、作品评论、小说比较和评论之评论等四辑。在我看来，其中关于海峡两岸小说诸多题材与类型的比较研究，该是更富于开拓性和现实性的论题。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长期阻隔，如今很有必要以整体思维进行比较和联系的研究，无论此岸的还是彼岸的，凡属有生命力的精神创造，莫不是共同民族文化的沿革和财富。王淑秧女士显然是出于寻求文化的共识、重建整合的秩序的远虑，运用比较的策略，分别就“寻根”、“乡土”、“文化”、“荒诞”、“科幻”和“女权主义”等问题，对两岸小说的异同作了初步考察。这种考察表明，尽管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有异，作品的风格韵味和语言运作有别，但传统的文化意蕴却共时地在两岸文学中游动如岚，则使读者更清晰地看到此岸或彼岸一样地和祖国文化的母体息息相通。例如潜心论评的“乡土”、“寻根”，不啻是承流变的文化内涵和经久不衰的母题，作者在阐述时旁征博引，剔误抉奇，对民族与地域、母体与变体的绾结进行了较有说服力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乡音母语、人生四季是如此“剪不断，理还乱”地萦绕着两岸小说家的思绪。自然，这种研讨若能在深化的解质中继续下去，以作家作品所提供的经验世界为起点，伸延到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和心理的图谱如何糅合胶契，进而探视群体无意识的深层结构，或许更会平添一番评审的理趣。

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王淑秧女士在《海峡两岸小说论评》中已做了诚为可贵的整合文学秩序的初步工作。文学与世事相仿，也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何况我们被阻隔了太久太久。就研究台湾文学而言，大陆学者目前是“隔岸观文”或“隔海捧月”，存在

着资料不足的局限，却也自有易于客观、保持独立判断的长处。文学批评家总是追求着综合兼备重群体之统一与重个性之发抒的艺术精神，以高悬一时代、一民族文化的气魄与规模为神往。那么，把海峡两岸文学置于以大陆文学为主体的世界华文文学的总格局去研讨，以整体的目光去观照同中有异、共存互补的各地文学，在创作和研究中逐步地把历史潮流、时代精神与地域文化、民情风俗贯通起来，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创作水准的提高和研究品位的提升。

这本有价值的论集既成，嘱我赘语，自顾学殖荒落，安能一一细说？但想到整合离析的文学确系关乎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的重要环节，故不揣管蠡之微，试言海天之大，亦仅属粗陈随感，聊备参采而已。是为序。

1991年9月末于北京

充满开掘意识的研究

——序王淑秧《海峡两岸小说论评》

古 继 堂

就整个文学研究领域讲，台湾文学研究是一个充满稚气的新兴学科，是一块刚刚开辟的文学研究园地。它在神秘感、新鲜感、陌生感相混杂的气氛中，走过了十一年岁月，小学还未毕业。

由于这是一个新兴学科，百废待举，处处等待着、呼唤着拓荒者的来临，处处期待着播种，处处都有用武之地，因而凡是具有一定的研究素质又执着于这一事业的人们，来到这里不仅可以找到栖身之所，而且可以获得成功之路。不过，这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讲，任何新生事物又都受到创业难的制约。尤其是台湾文学研究，不仅没有，或者很少有现成成果可供借鉴，而且海峡阻隔，研究对象十分遥远，除了隔着自然的海峡外，还隔着一个意识形态的海峡，一般情况下，因资料的极度困难，就文本研究也无法尽如人意。由于这一特点，就要求从事台湾文学研究的学者比别的文学研究者更加执着，更加刻苦，具有更坚韧的钻研精神。

王淑秧同志从事多年专业文艺理论研究，从1989年起才进入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不到三年时间，她便成果斐然，不仅选编了台湾小说选等书，而且撰写了本书中所收的近20万字的研究论文。这种突出成就在短期内的获得，一方面是得力于她深厚的文

艺理论修养，另一方面归功于她十分执着而刻苦的治学精神。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她虽然从事专业文艺理论研究多年，取得了不少成绩，到了中年后期才转入台湾文学研究，但她专业思想十分稳固，这是她在短期内能够获得上述成果的最重要的思想保证。科学研究如同登山，只有专心致志，百折不挠，一丝不苟，象过河的卒子，死活向前，才能攀上高峰。

科学研究仅仅有稳固的专业思想和执着的追求精神，还远远不够，这只是一个素质上的保证，更重要还在于寻找和选择契机，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和切入的途径，还在于要有勇敢而果断的射门意识，不失时机地进行精神和物质的转化，将自己内心的思考转化为物质形态的文字记录。这种积极寻找和选择契机及勇敢的射门意识的融合运用，大概就是开拓意识。开拓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创新意识。而创新意识无论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都至关重要，都是生命和灵魂。王淑秧同志的开拓意识极强。从本书所收论文来看，王淑秧同志的开拓意识有以下一些内涵：

1. 准确把握学科方向。文学园地十分广阔，纵向看从古到今，横向看题材波及整个宇宙。即使仅有两千万人口的中国台湾地区的文学，浩浩宇宙也在它的囊括之中。在这样宽泛而广袤的文学园地上，可以种粮、种棉、种花、种树，也可以播毒草和荆棘；可以建筑辉煌的心灵殿堂，也可以建造阴暗的精神地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台湾文学，呈现的面目异常复杂。有民族的正气歌，比如赖和、杨逵、吴浊流等人的作品；有亲切的祖国颂，比如巫永福的《祖国》、陈秀喜的《我的笔》等诗；有西化思潮中出现的崇洋媚外之作，也有个别的宣扬“台独”意识的作品，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遗迹，“皇民化”文学的影响，同时也有反西化，反“台独”，反“皇民化”的革命的战斗文学；有反共八股作品，也有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蓝图等等。面对如此庞杂的文学现象，

作为社会主义的文学研究家，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应该批判什么，鼓励什么。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以为，社会主义的文学研究家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去分析和鉴别资本主义的文学；不是要求台湾文学符合社会主义文学的原则，而是要求我们的学科研究要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比如，我们要批判和否定崇洋媚外和分离主义倾向的文学，要充分肯定、高度评价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作品。王淑秧同志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就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她的《光复前台湾小说中的民族意识》一文就是例证。该文从台湾当时的历史背景切入，然后展开对赖和、杨逵等台湾日据时期重要的爱国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述，把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强烈的抗日民族意识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们清楚的看出，殖民地的台湾呈现的日本的强权，中国的精神；土地的殖民、精神的爱国的相反的奇异现象，证明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真理。在评论海外华人作家赵淑侠的长篇小说《塞纳河畔》时，她也突出地抓住作品“根”的主题进行阐述。不管任何事业，不仅都存在一个方向问题，而且首要的都是方向问题。台湾文学研究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研究的一个学科，应该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文学研究的方向，即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去探求台湾文学的规律和本质。如果脱离了这个方向，我们的研究就会出现混乱和错误，就会发生灾难性的倾斜。错误的去肯定不该肯定的东西，否定不该否定的东西。台湾文学研究实践中，这种教训并不缺乏实例。

2. 寻找和选择切入点 科研人员面对丰富而庞杂的研究对象，有如地质师面对一个地域广阔、藏量丰富但却构造复杂的油气田。怎样开掘，井点选在什么地方才能达到多出油、早出油、出好油的目的？根据现有的人力、物力施行怎样的程序才能扬长避短？其中充满辩证法。尤其是对一个掌握资料并不丰富的初入门的研究者，怎样才能以少胜多、快速有效，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尤为重要。

王淑秧同志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切入点。王淑秧同志长期研究文学理论，又与张炯同志密切配合作现当代文学，并出版了《丁玲创作论》等著作，对大陆当代文学尤为熟知，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因而她的所长是文艺理论和现当代文学。而王淑秧同志为了发挥自己所长，她把自己研究台湾文学的切入点，选择和确定在两岸文学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非常聪明和有见地的选择。她抓住“比较”二字不放，一连写了七个方面：即：赖和与鲁迅的小说比较、两岸寻根文学比较、两岸乡土文学比较、两岸文化小说比较、两岸荒诞小说比较、两岸科幻小说比较、两岸女作家的女权主义小说比较。近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在东西方都非常盛行。这是一个跨地域性的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它通过不同国度和地区文学的对比研究来发现文学共同的本质规律，并启发和疏导各地区文学取长补短达到繁荣和发展之目的。比较是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比较的目的不仅在于鉴别优劣和高下，更重要的在于内在规律的开掘、发现和发展，在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于对客观事物在众多参照系数下的深化认识。王淑秧同志抓住了两岸文学比较的切入点，去展开两岸文学的深广世界，研究出它们的异同。进而告诉人们，同根、同族、同源、同流的民族生活和文化基因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岸文学，有其许多根本的、深刻的、共同的内在规律，这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说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祖国分裂和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下的文学，又有许多本质的不同点，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对台湾文学必须分清精华和糟粕而区别对待。王淑秧同志对两岸文化小说的比较，论述得清晰而深刻。邓友梅的《烟壶》和司马中原的《红丝凤》等作品，不管是取材和开掘，以及生活背景，工匠技艺，人物塑造诸方面都有内在相通和相似之处。这些相通和相似，是血缘、地缘、族缘、亲缘的深层积淀，而不是生活表层的浮游物。作为民族和祖国共同生活、共同创造的

历史例证，是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的。目前在台湾文学研究中，对两岸文学进行比较性的研究，还比较少，可以说是刚刚开始，王淑秧同志的论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这一领域开拓了一个新的原野。

3. 宏观概括和微观剖视相结合。文学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新的开拓意识的实现，仅仅靠研究对象切入点的巧妙选择，还是不够的，它仅仅为这种意识的实现找到了门户和途径。要使这种开拓意识通过研究活动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完成由精神到物质的转化，还有赖于将蓝图放成大样和精细的施工过程。王淑秧收入本书的论文除了《赵淑侠〈塞纳河畔〉的“根”意识》等几篇具体作品评论和《读古继堂〈台湾小说发展史〉》等论文外，其他均是宏观性的研究。宏观性的研究和微观性的研究有着各自最容易犯的毛病。宏观性的论文一般容易空泛，象天马行空，无足无腿；而微观性的论文一般又容易拘泥，象虽有翅膀但却飞不起来的鸡鸭。宏观性的空泛和微观性的拘泥，均难以实现作者的设计意图。王淑秧关于宏观性的研究论文，每一篇都有比较扎实的微观性的作家作品的分析来作为论点的血肉和注脚。比如她进行两岸乡土文学比较时，大量地列举并分析了两岸的乡土文学作品。大陆作家的作品，她列举了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张伟的《古船》，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等。台湾乡土作家的她列举并分析了陈映真的《夜行货车》，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以及老一代作家赖和、杨逵等人的作品。在论及两岸文化小说的比较研究中，她列举并较详细地分析了台湾作家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司马中原的《红丝凤》，施叔青的《窑变》等。大陆作家的作品中分析了邓友梅的《烟壶》，王安忆的《小鲍庄》，冯骥才的《三寸金莲》等，并对两岸作家的同题小说，比如张系国的《棋王》与阿城的《棋王》进行了比较。王淑秧的这类比较论

文大都写得能收能放，收有脚可行，放有翅可飞。有不少方面从具体作品的比较分析中，抽象出来的理论观点是比较准确和令人信服的。在这些分类的比较论述中，王淑秧几乎对每一个方面都既联系了历史的发展又关照了现实的样态。这种有收有放、有翅有脚，既有宏观把握又有微观剖视的有血有肉、有骨有架的研究，使作者充满开拓意识的设计意图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目前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虽然主流是好的，是健康的，但一些非主流的和不健康的东西也时有出现。比如研究动机上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和讨好台湾作家，对台湾文学中某些并非优秀的东西进行无原则的吹捧；有的在研究途径上投机取巧、抄袭别人的成果；有的在研究思想上缺乏刻苦踏实作风，东扯西拉、东拼西凑等。这些现象给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带来了隐忧。王淑秧同志在台湾文学研究中，虽然充满紧迫感，但她的踏实、刻苦、深入思考的研究态度和治学作风却令人敬佩。从事科学的研究，正确的态度、纯洁的动机、刻苦的作风非常重要，有了这三者就能抗拒名利的诱惑，文学的天平就不易在风波中有意倾斜。即使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也比较容易改进和纠正。

通读了王淑秧同志收入本书的文字，也感到有以下明显的不足。其一是，因微观研究的基础相对薄弱，对台湾文学发展进程中有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不够熟悉，因此在给自己的观点作注脚时，仿佛读过的台湾文学作品不够使用，于是便出现了观点与注脚不太吻合的现象，所举作品不是十分合适，而合适的作品又没有列举。其二是，仿佛有的文章成文比较仓促，文中个别问题的思考还不够十分成熟和深入，论述上还存在着可以深化和补充的地方，比如，对两岸“寻根文学”的比较，似乎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索。如果以上两点也算不足的话，那么这种不足是未达，而不是失误。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不足是一切研究工作和任何研究工作者均很难避免的现象。尤其是宏观性的研究文章，时空长、

含蓋面宽，涉及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较多，不仅对一个涉足不深的学者是困难的，就是对一个多年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人来说，也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加之研究资料缺乏而又得之不易，在许多情况下，作者是无法作到信手由缰，旁征博引的。于是就不得不被迫改变和压缩自己原定的设计意图，或者在某种细节处作“缺席”处置。这种情况，必然给自己的研究成果打上某种生涩的烙印和令人遗憾之点。这是大陆的台港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中常常发生而又难以解决的“老大难”。不是不为也，而是无能为也。这是一种令人疚心的意识到，但却难以抚平的缺憾。不过，王淑秧同志的论著中存在的不足，并不都是这种难以解决的主、客观的矛盾，有的问题，却是通过主观努力可以解决的。我想，通过主观努力能够克服的不足，也无需我来唠叨，因为任何一个纺织工，都不愿在自己纺织的锦缎上，留下一个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疵点。

1991年6月29日
于北京西郊寒舍

目 录

序：整合离析的文学

- 从王淑秧《海峡两岸小说论评》谈起 杨匡汉 I
充满开掘意识的研究
——序王淑秧《海峡两岸小说论评》 古继堂 VI

—

关于两岸小说的比较

- 在“海峡两岸文学比较”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 2
开拓者的足迹

- 关于赖和与鲁迅的小说 17
彩贝与山花

- 关于《金水婶》与《种包谷的老人》 32
根脉相连血相通

- 海峡两岸的“寻根文学” 36
大地的儿子 民族的魂魄

- 海峡两岸的“乡土小说” 56
中国文明的艺术晶体

- 海峡两岸的“文化小说” 78
新鲜、陌生、惊愕与思考

- 海峡两岸的“荒诞小说” 95

人类未来奇异的畅想曲

——海峡两岸的“科幻小说”	110
同曲异奏 和声共鸣	
——海峡两岸女作家的女权主义小说	129

二

光复前台湾小说中的民族意识	150
七十年代台湾小说三题	166
赵淑侠《塞纳河畔》的“根”意识	187
性格的鲜明塑造与多层次的艺术对比	
——读李兰的《红唇》	199
张系国《游子魂组曲》的叙述艺术	207
玲珑剔透 神妙入微	
——读刘以鬯的《珍品》	214
灵魂的惩罚与构思的巧妙	
——读陈映真的《文书》	218
斑斑点点似血红 杜鹃声声劝人归	
——读白先勇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	223

三

读古继堂的《台湾小说发展史》	228
读封祖盛的《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	236
读汪景寿的《台湾小说作家论》	244
后记	
后记	252